

百科探索

智媒时代下四川红廉文化传播力优化路径研究

张相松 胡静

(四川轻化工大学)

摘要：智能媒体时代，红廉文化的传播样态、内容生产、传播场域发生了极大转化，四川红廉文化传播应充分抓住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以及全效媒体的发展机遇，聚力多维联动、挖掘四川红廉文化资源，聚焦新兴媒介、讲好四川红廉文化故事，聚合传播力量、打造四川红廉文化品牌。

关键词：智媒时代；四川红廉文化；传播力；优化路径

2022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廉洁文化建设，强调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实起来、强起来，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这要求着不断提高对廉洁文化传播的重视。面对媒体格局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四川红廉文化作为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特定形态，其在智媒时代下的传播面临着全新契机。

一、四川红廉文化

巴山蜀水，红色永存。在四川这片鲜红的革命热土上发轫和延续的红色文化形式丰富、意义深远，革命英雄、将帅故里、川陕苏区、长征丰碑、两弹之城等都是四川红色文化关键词。而四川红色文化饱含廉洁因子的部分也不在少数，从红廉人物、红廉故事、红廉作品交相辉映，四川红廉文化中的红色文化与廉洁因子深度融合：其一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先进性，四川红廉人物的故事家喻户晓，如克勤克俭、清正廉洁的邓小平；立德树人、勤俭持家的朱德；恪守清廉、一心报国的吴玉章；坚贞不屈，绝对忠诚的江竹筠等。其二具有突出的指导性，红廉文化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能成为精神指南，团结群众力量，在当今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中仍具有强大凝聚功能，对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文化、开展廉洁教育、一体化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红廉文化源于英雄先辈们在革命和建设中为国奉献、清廉无私的历史，四川红廉文化包括了从革命战争时期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征程中所形成与留存的精神成果及其物质载体，二者相辅相成，本文主要聚焦探讨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发端的。一是以四川红廉文化为内核的精神成果，既包括在革命战争中逐渐形成的系列红色廉洁精神；也包括承载这些精神的歌谣、影视、戏曲等非物质形态资源，如红色歌谣《红军来了救穷人》《十把扇儿唱红军》《卖拆歌》、红色诗词红色口号等。

二是承载四川红廉文化的物质载体，主要是指革命时期四川军民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过程中，所保留下来的相关地方与场所，或能以客观真实的形态展现的实物，如：革命遗址、革命纪念馆、先烈故居、文献手迹等。意义深远的精神成果，保存较丰的物质载体，都为四川红廉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二、智媒时代下的四川红廉文化传播

(一) 四川红廉文化的特质

四川地域的独特性。四川红廉文化资源的独特性，有彰显艰苦奋斗的广元市中国红军城、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有彰显红军战士不惧强敌、不畏艰险，坐落在大渡河畔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有川陕革命根据地流传的《红军十大纪律歌》，有被誉为红军标语之王的“赤化全川”，这些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篇章，这些曾经唤醒革命群众的战斗号角，都深深打上了四川地域的独特烙印。

历久弥新的指导性，红廉文化在诞生之际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现实性、凝聚力和感召力，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过程中，又在革命中不断丰富发展。1932年12月-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的大巴山区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这也是继中央苏区之后全国第二大苏区，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和川陕苏区党员干部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川陕省委制定九项纪律，红四方面军制定十条纪律。“川陕苏区的廉洁文化，于当时，是革命成功的思想保障；于今日，是当地教育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鲜活教材。”^[1]

(二) 智媒时代的传播优势

人类社会媒介技术不断发展，新的媒介时代已然来临。彭兰教授在2016年的新媒体发展趋势报告中，概括出“众媒时代”的五大特征：表现形式的碎片化，生产主体的大众化，传播结构的大众化，传播平台的分众化，多屏跨越的多样化。近年来，以AI、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以及5G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兴起，“众媒”正加速向“智媒”转变，从传播内容到传播途径，都为四川红廉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新时代要想推动四川红廉文化传得更广、走得更远，需要充分抓住智媒时代机遇，促进四川红廉文化传播从理念到实践的更新。

一是红廉文化的传播形态变化,呈现“界面沟通”特性、图像符号化、数字媒介化,为红廉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二是红廉文化的内容生产变革,为红廉文化的网络传播提供了现实机遇与必要情境。这种变革首先体现在内容形式的多样性上,从传统的文字描述,逐渐转向图片、视频等更为直观、生动的表达方式。这种从静到动的转变,不仅让红廉文化的内涵更加易于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也为其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三是从红廉文化的传播场域普及,提升了红廉文化传播实效。首先随着网络办公、社交和信息发布平台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使得红廉文化所承载的训诫与教诲不再是简单的宣传口号,而是深深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三、智媒时代下四川红廉文化传播力优化路径

在智媒时代背景下探索四川红廉文化传播模式、优化四川红廉文化的传播路径对增强四川红廉文化传播的有效性、提高四川红廉文化的知名度和增强青少年对四川红廉文化的认同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新时代四川红色红廉文化传播优化路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 聚力多维联动,挖掘四川红廉文化资源

政府需与各级教育、文化、旅游等部门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提升合作效果,共同构建优势互补的和谐局面,以吸引更多成为四川红廉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以及传播者。首先需深入挖掘红廉文化的内涵,依托丰富的历史资源,开创符合时代精神的新风尚。在2022年5月27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大会报告强调了四川深厚的文化底蕴、璀璨的文化遗存以及丰富的红色资源,呼吁加快新时代文化强省的建设步伐^[1]。其次要以之铸魂育人塑造良好的社会风尚,要在丰富的红色文化中提炼廉洁因子,不仅要传承,更要广泛传播。再者要对其传播方式和手段进行创新。政府应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同时吸纳民间资本,加大资金投入,例如加强红廉文化的宣传,结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等。最后要推动红廉文化的传播,博古通今,筑牢文化根基。政府应加强资源整合,将四川的红廉文化与红色旅游、生态文明旅游等相结合,讲述红廉文化的故事,以促进其传播。

(二) 聚焦新兴媒介,讲好四川红廉文化故事

新兴媒体以其广泛的传播范围和迅速的传播速度,显著地推动了红色文化从抽象概念向具象化、可视化和大众化的转变。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高达9.62亿,较2021年12月增长2805万,占网民总体的91.5%。在传播途径上,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以短视频或微电影等形式,将红廉文化作为核心内容推送给广大用户,从而扩大红廉文化的传播范围,

提升其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从传播载体来看,红廉文化的传播不仅限于网络平台,还可以组织研究红廉文化的专家学者进行线下讲座等活动。在创新媒介传播形式上,政府可以探索采用舞蹈、歌曲、戏剧和雕塑等多种形式,使红廉文化更加贴近生活实际。例如,可以借鉴川剧文化的传播经验,通过川剧变脸等独特的地域文化表演形式,将红廉文化的元素融入其中,吸引更多游客关注和参与,从而提升四川红廉文化影响力。

(三) 聚合传播力量,打造四川红廉文化品牌

四川红廉文化独具爱国主义内核与四川地域特色,其红廉人物与故事所展现的民族性特质,不仅让其在四川地区享有盛誉,更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如江竹筠的狱中家书、吴玉章的《哭吾妻丙莲》以及邓稼先仅凭二十元奖金便毅然投身“两弹”研发的先进事迹,均是以爱国主义精神和廉洁思想为核心的典范。为了拓宽红廉文化的传播广度,首先可以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政策,设立红廉文化示范点,深入挖掘并整合当地资源。依托四川丰富的红色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发展具有四川特色的红廉文化旅游项目,通过旅游业的繁荣发展推动红廉文化的传播。其次要提升四川红廉文化的温度,使其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现象。借助四川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藏族、羌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与红廉文化相结合,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红廉文化品牌。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生活的文化形象,让红廉文化更加贴近大众,从而增强其亲和力与感染力。

参考文献:

[1] 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 第7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

[2] 中共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委员会网站,巴中市通江县:深挖红色资源 做深做实廉洁文化建设【EB/OL】2022-04-13,

<https://www.scjc.gov.cn/scjc/jyfy/2022/4/13/d7988cd7f58c4a8692e1e94dbc1effdd.shtml>

[3] 王晓晖.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团结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在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06-02)

[2023-03-27].<https://sichuan.scol.com.cn/m/gcdt/202206/58534415.html>.

作者简介:张相松(1996-),男,汉族,四川广元人,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红色文化研究。胡静(2000-),女,汉族,四川遂宁人,主要研究方向:美术教育与红色文化研究。

项目资助:本文系自贡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一般项目《四川红廉文化传播力提升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ZMCY202211)